

## 自我认同的建构:青年“日翻圈”文化研究

■ 刘朝霞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日翻圈”已成为青年亚文化的重要生产场域,青年通过亚文化生产实践建构起自我认同。一方面,“日翻圈”的新部落为青年重塑自我提供了无限可能。“日翻圈”音乐生产方式的自由、开放与互动,极大地激发参与者重新发现、培育自己的能力,获得新的主体性自觉,从而建构起自我的认同。另一方面,抵抗仍是自我认同建构的主要方式,只是区隔与娱乐成为抵抗在数字空间新的表现形式。“日翻圈”的青年亚文化以一种“虚化”的方式实现对主流文化的反叛与逃离。要实现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和解,应该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以“与我无二”的心态彼此接纳,创设多元文化社会。

**【关键词】**自我认同 日翻圈 亚文化 主体性

何为“日翻圈”“唱见”“洛天依”……?笔者在70后与90后中做过一个简单调查,结果发现,90后普遍熟悉的这些词汇对70后而言几乎完全不知。这从侧面凸显了一个时代问题:伴随网络成长起来的90后乃至00后们所共享的文化与我们这些70后、80后的文化迥然不同。我们正在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如果连“我们一代”与“年轻世代”之间的代际矛盾与差异都无法弥合,何谈全社会的和谐?因此,本研究以“日翻圈”为切入点,探究青年亚文化群体以及他们在新部落中建构起的新自我,希望通过此项研究,唤起主流社会和相关学者乃至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并思考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以及双方如何和谐共处的问题。

### 一、概念界定及研究缘起

“日翻圈”属于圈内人的一种模糊称谓。本文研究的“日翻”是指由虚拟歌姬诞生引发的,聚集在弹幕网站通过虚拟歌姬进行歌曲创作、视频创作、歌曲翻唱、弹幕制作等活动的日式翻唱文化。“日翻圈”就是这样一个“日翻”文化的聚集地和宅系音乐爱好者的群体。

年轻人为何喜欢“日翻圈”?为何喜欢“翻唱”?他们在这一新部落中的亚文化实践对自身主体性的建构有何意义?对于青年亚文化的构建而言有何意义?这些问题亟待解答。然而,在中国知网上搜索未发现有关“日翻圈”的论文,在2012-2014年《青年亚文化年度报告》中,也

收稿日期:2016-02-15

作者简介:刘朝霞,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新闻学、青年亚文化。

未发现相关研究。学术研究的空缺与现实情景中“日翻”文化的迅猛发展形成了极大反差。相关学术研究亟待跟进。

国外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主要贡献者伯明翰学派主要围绕“抵抗、仪式与收编”对英国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展开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一代文化研究学者越来越倾向主张亚文化研究向“后亚文化”研究的转向。他们广泛使用“生活方式”“新部落”“场景”等新的概念和理论视角,试图解释青年亚文化的认同不再那么受社会分工和阶级地位的影响。“青年亚文化的‘抵抗’是否真的已死”<sup>[1]</sup>?这一亚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在“网络一代”青年的亚文化实践中表现如何?青年如何在数字空间建构起自我的认同以及建构了怎样的认同?厘清这些问题,对推进网络时代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不无裨益。因此,本文试图透过“日翻圈”这一青年亚文化的“新部落”,观察部落成员的亚文化实践以及“新部落”文化共同体的特征,从中分析部落成员自我身份的建构。

##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分别从个体自身及圈子形塑两个方面出发,搭建了一个双向印证的测定体系<sup>①</sup>:

第一,对“日翻圈”内个体的访谈,试图解决“日翻圈”中个体如何看待自我及圈子的问题,即自我的认知及建构。“日翻圈”的参与者分为普通爱好者和“生产者”两大类。前者属于普通网民,后者包括P主<sup>②</sup>、PV师<sup>③</sup>、唱见<sup>④</sup>等。访谈对象分别从这4类人中寻找代表性人物。本研究共访谈了9人<sup>⑤</sup>,包括1位P主(圈内地位最高的“教主”),他是3首中文传说的作者,其中《普通DISCO》是中文第一首传说,也是最快传说、点击率最高传说,因此在圈内被封为“教主”;1位PV师,某传说曲的制作者;2位知名唱见;5位普通爱好者,其中2位有翻唱作品,3位没有。

第二,对数字空间的“日翻圈”做内容分析。试图解决圈子为圈内人提供了哪些自我建构的要件问题,即新部落建构了怎样的“文化共同体”。从两方面切入:一方面,我们挑选B站音乐频道2015年10月13日到11月12日4周排行榜的40个作品进行内容和文本分析。另一方面,对目前国内“日翻圈”6首中文传说进行了文本分析。

## 三、自我的重新发现

### (一)“日翻圈”音乐生产方式的革新

“日翻”发展到今天已经具有比较成熟的线型生产结构,但并非单纯的流水线结构,而是每一个节点都呈放射状,具有明显的合作性和自主性。“日翻圈”的生产大致分为3个阶段:初创、二次创作和商业化。初创阶段比较简单,主要包括制作歌曲和制作PV。利用虚拟歌姬,人人皆可制作属于自己的歌曲。歌曲创作完毕可以要求PV师为自己的作品配上PV。这属于作品原创阶段。之后则进入丰富的二次创作阶段。唱见可以自由发挥翻唱歌曲,一首原创曲会有N个版本,几乎相当于又创造了N首曲目。音乐生产在翻唱过程中得到了极大拓展。网民还可以对作品文本进行再生产。比如,网友可以针对一首歌制作出不同版本的空耳歌词,那些歌词

① 此处对日翻圈个体的访谈,以及对“日翻圈”的内容分析部分,由我院2013级本科生严宇馨参与完成。特此致谢。

② 即 Producer,指制作歌曲的人。

③ 制作MV的人,又分为画师和动画。画师专指画图的人,而动画则指将画做成动画效果的人。

④ 就是歌手,只是在日翻圈里使用这一特定称呼。

⑤ 笔者将9位访谈对象按照S1-9的顺序编码,下文均以编码指称访谈对象。

都能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对原作加以重新演绎。或者,网友还可以转化创作视角为原曲创作新的歌词,也可以制作“神弹幕”,通过设定弹幕的颜色、位置、形状、持续时间等,与歌曲融为一体。前述两个阶段的创作都可以实现商业化。不过,最具商业潜力的当属唱见。

## (二)青年借由音乐生产重新发现自我

“日翻圈”音乐生产方式的第一个特点是开放。正是这种“开放性”为青年参与者的自我建构提供了无限可能,青年可以获得新的个体身份。新的音乐生产打破了传统专业音乐人的垄断,也打破了音乐创作者与听众的界限,开创了“人人皆音乐人”、“人人皆歌手”的新时代。本研究访谈的9位对象全部为非专业音乐人,多数为遍布海内外的学生,所学专业也非音乐及相关专业。正是这些非专业的学生,要么通过优美的歌声成为备受欢迎的“名唱见”,在现实世界他们很可能会因为外形等其他条件而没有演出机会;要么通过开发自己的创作潜力,成长为一名备受瞩目的P主,这种“业余选手”在现实世界本不可能获得创作机会;要么通过为自己喜爱的作品制作PV,成为一个备受追宠的PV师……

“日翻圈”音乐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点是自由。这种自由,极大地激发了青年人的创作欲望,在此过程中,年轻的参与者重新发现了自己的能力,勇敢地展现自我,在收获他人认可的同时反过来又给予自己更大的满足感,这种双向的良性互动帮助个体在圈内建构起新的身份认同。访谈中发现两位普通爱好者S5和S8均因为“日翻圈”而自学日语,学会了唱日文歌,S8甚至还萌生了当一名PV师的想法。PV师S2表示要从事这个工作需要英语棒,并且会平面设计懂乐理。多数爱好者表示这个圈子的确让自己的能力得到了提升,自信心增加,也在圈内建构起新的身份。S9就表示,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大家自学的,说明自学能力是当代青年、青少年中非常重要的能力,同时,大家也非常乐于分享。

名唱见S3也表达了圈子给予她的成长与肯定:“我不太敢在人前唱歌,因为太紧张了,但是在网上就不一样了,自己用心录制的歌曲发在网上被人下载评论说一些肯定的话就会觉得特别开心,感觉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自己的努力也得到了认可。”

“日翻圈”音乐生产方式的第三个特点是互动。传统音乐传播属于单向传播模式,听众无法及时反馈感受。“日翻圈”改变了这一点,普通听者(观众)可以在观看一部作品时创作弹幕,即时发表对作品的感受。听众参与音乐文本的再生产对其自身认同的建构,以及原作者的认同建构都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

“日翻圈”的参与者就在音乐的生产、翻唱,抑或音乐文本的再生产中乐此不疲。通过梳理9位访谈对象的访谈内容,发现最大的驱动就是追求“个性”。“日翻圈”“最大的魅力是小众!个性感!现在大部分人都会听音乐对吧,但是我觉得那种主流的东西总容易让人乏味”<sup>①</sup>。不一样的音乐、不一样的版本、不一样的画风、不一样的曲风……借由种种的“不一样”,参与者成功实现了对“他者”的区隔,也实现了对社会趋势的“抗拒”,它们表面看来是对社会普遍趋势的反应,是为了意义的自主性来源而抗拒这些社会趋势<sup>[2]</sup>。

同时,“日翻圈”成员运用声音、视频、文字或者弹幕致力的媒介文本创作及二次创作,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了“无组织的组织力量”<sup>[3]</sup>,大量经二次创作的作品为同好、网民无偿分享,创作者们通过复制和拼贴文本,自我投射于文本,在凝视和反思中,寻找积极的个体和群体身份认同,在网络空间中构建超越现实的线上身份,并进而创造和累积亚文化资本,这是新部落亚文化实践的意义所在。

① 来自S3的访谈内容。

## 四、自我主体性自觉的建立

对主体性的自觉在“日翻圈”参与者中非常普遍,并且以各种不同方式得到了展现。这其中包括对自己及所在圈子的高度自信,也有对这个圈子“自由”精神的认知与执着,还包括对收编的清醒认知与拒绝。对自我及圈子的自信,体现了圈内人的主体性自觉。“教主”S1在谈到弹幕时不无骄傲地宣称“我们对二次元的事最挑剔也最在行”。除此之外,每个圈内的人,都会在这个圈里找到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来自圈内人的鼓励和认可进一步增加了他的自信,对其自身主体性建构会有正向刺激。“教主”在谈到看自己作品的弹幕获得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时表示:“虽然我不能记得所有弹幕的内容,但如果是新来的弹幕,我差不多能够分辨。那是真的。弹幕池里的1500条弹幕就是1500个不同的朋友,我能看得到他们的情绪被我的歌带动得时而紧张,时而激动,时而若有所思,我很高兴他们喜欢我的歌,这是对一个创作者最好的奖励,最好的,没有之一。”

这个圈子的核心精神是什么?被访谈者提到最多的是“自由”。自由创作、自娱自乐、自我满足……S9就认为他们这些人在“日翻圈”里更多就是“自娱自乐”,这非常重要。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自我意识可能比前几代人萌发得更早,干事情之前,我们可能并不是想去获取别人的眼光,而是先愉悦自己。看到好看的PV于是觉得自己也可以尝试去做PV,看到虚拟歌姬在唱歌于是自己也觉得可以去尝试。”

“日翻圈”中的亚文化群体渴望超越他人的引导,而完全尊崇自我意识的引导<sup>[4]</sup>。基于对这种“自由”精神之看重,“日翻圈”内的人对收编、尤其意识形态的收编保持相对清醒的认知。研究中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在研究之初,笔者苦于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称呼来命名这一群体,偶然想到现在“播客”、“博客”各种“客”流行,心愿是不是可以用“翻客”来命名?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普通爱好者S9的明确拒绝:“所有翻唱者都可以叫翻客。如果叫日翻客是不是太闷了?主要是这个名字在圈内是没有存在感的,这种收编其实有点残忍啊,感觉把日翻的自由感消减了。”

无论自信的建立,抑或自我的满足还是自我意识的强化,都昭示着主体性的建立。何为主体?我把主体定义为成为一个个体的愿望,它创造了个人历史,赋予了个人生活经验的全部领域以意义……从个体转化成主体有赖于两种身份的必然结合:一个是相对于共同体的个人,另一个是相对于市场的个人。通过主体,个体才在自身的经验中达到了完整的意义<sup>[5]</sup>。这也意味着自我认同的建立。因为认同组织起来的是意义。意义是社会行动者对自身行动目的的象征性认可(identification)<sup>[6]</sup>。

## 五、抵抗中建构自我认同

研究选取2015年10月13日-2015年11月12日B站音乐原创排行榜上的40部作品和6首中文传说曲进行内容和文本分析。统计发现,这些热门作品的风格主要分为几类:思考自我与现实、古风、民族风、民国风、和风、色气向和想象类作品。

### 1. 抵抗——建构自我认同的主要方式

排行榜中,含有现实、抵抗意味的作品数量最多,约占48%。其中《学生素质教育系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抨击了现时“成绩至上”的学生素质教育。歌词唱道:“‘你的理想是什么?’请用不少于八百字回答我,我没犹豫,写下他们所期待的无个性的梦……难道现实就是你能够懦弱的理由吗?难道这规则就是你能够逃避的借口吗?”另一首代表性曲目是《大时

代》，歌词充满了对这个时代深刻的认知和批判。创作借用狄更斯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抨击了这个人人疾行匆匆的时代，也赞美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歌中唱道“这个时代走得太快，不知道是好是坏……要节操，还是钞票……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的时代”。视频有个画面模仿新闻联播开头那个蓝色背景的经典画面，但字幕置换成“新闻插播”，然后接着出现两个红字“广告”被框起来并划斜线，表示禁插播广告。这种处理显然包含了对权威的戏谑与嘲讽。还有一首中文歌曲《普通 DISCO》，是目前为止中文歌曲中点击量最高的曲目。“普通”一词贯穿全曲，“在这普通的一天，我穿着普通的鞋，很普通地走。在这普通的街，掏出普通的耳机，找点普通的感觉，来一首我最爱的普通音乐……”但当你“跟着普通的节奏，身体普通的抖动，这普通的一切都变得不同”。歌曲借“普通”的叙事传达的却是作者抗拒“普通”，渴望非凡的信念。你我本是普通人，但正因为我们都普通地喜欢同一样东西，就变得不同。我们借由“喜欢什么”而区隔那些“不喜欢什么”的人，在这种区隔中实现了自我的建构，也实现了对“他者”的抗拒。

在反思类歌曲中，既有严肃的反思、批判现实的作品，也有戏谑、恶搞的作品。虽然这些批判更多停留在口头上，也主要存在于数字空间，并未采取现实中激烈的反抗手段或行为，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些作品的“抵抗性”。如果说，原先青年亚文化主要集聚和滋生于放学后的校园、废弃的工业区、街角、公园、影院、酒吧等相对狭窄的实体空间，那么，新媒介情境下，依附于网络空间的青年亚文化，进一步消融了时间和空间对于“抵抗性”的限制，反而“抵抗”可能更“遍在化”。原先小范围发生的“抵抗”，伴随互联网空间的开放性，获得了扩散。

## 2. 抵抗的变化——泛化、多元、虚化与“遍在化”

在排行榜中，还有一个类别“古风类”跟反映现实的曲子几乎等量，约占42%。如果说反思类曲子多有对现实的反抗，那么古风曲却是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在“日翻圈”中的直接成果。有一首翻唱度很高的曲子《花儿纳吉》，借用了羌族歌曲中的一个固定唱腔，歌词的内容非常传统：既有对天地、祖先、爹娘和友谊的美好祝福，更有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画面搭配也是清新淡雅充满民族风。无论是从旋律还是从内容来看，这首歌跟我们的民歌非常相似。

“古风类”曲风的流行，既有现实社会国学热的影响，也有流行歌曲“中国风”的映照。但不能就此简单推论古风歌放弃了抵抗，而被商业和意识形态收编。事实上，古风在“日翻圈”的流行可以看作“温和的抵抗”。喜欢古风，其实是一种“区隔”，进而形成一种风格。正如布尔迪厄所说：如果说传统社会是靠社会阶级的分化和对立来完成社会演变和重构的话，那么，现代社会是靠消费、休闲和日常生活风格的区分化来完成其社会区别和重构的。生活风格、品位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模式，即是个人和社会集团自我区分和自我表演的方式，也是社会区分化的原则<sup>[7]</sup>。除此之外，喜欢古风也包含着对现实的不认可，向往古代那种纯真的美好和爱情。这是对现实中受金钱、地位、身份等世俗标准影响的审美与爱情观的逃离与反叛。

因此，抵抗并未死亡，但已悄然发生变化。在“日翻圈”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抵抗”的对象逐渐“泛化”，既有权威文化，也有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抵抗”的形式则更加多元，原先正面的冲突与对抗，更多转变为娱乐化的方式，以轻松、戏谑、恶搞为手段；区隔的方式，以逃离、反叛为手段……抵抗的范围更“遍在化”。抵抗的结果则越来越“虚化”。毕竟所有的抵抗限于数字空间的逃避式、虚拟式抵抗，或者只能称为“抗拒”，只是一种“姿态”，而不再带来现实世界的实际行动。阿尔伯特·科恩认为：社会底层的青少年面临的巨大问题是无法抵达社会主流价值有关体面工作、金钱至上以及成功人生时所产生的“地位挫败”以及由此导致的紧张、沮丧、不满、内疚、辛酸、焦虑或绝望，青少年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就是拒绝、反抗，乃至越轨和犯罪<sup>[8]</sup>。在数字空间，这种因为迫于现实压力而产生的抵抗的确依然存在，但是不可否认，更多的抵抗在由这

种消极的抵抗转为积极的抵抗。很多“日翻圈”的参与者之所以选择日翻,意在“区隔”。为什么喜欢听日翻?因为要跟喜欢华语或者欧美歌的人区隔。为什么要自己进行日翻?要与那些只会听歌的人区隔。人们在这种“喜欢”中表达着自己的不喜欢。此外,“日翻圈”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娱乐,一切皆可娱乐。娱乐是一种高级的抵抗,但也可能让人意识不到抵抗,使人在娱乐中麻木——这或许是它的自我收编。

## 六、结语

“日翻圈”的音乐生产呈现出不同于传统音乐生产方式的开放性、自由性、互动性,正是这些特质极大地激发了“日翻圈”参与者的创作热情。在新部落中,参与者通过重新发现自己的能力,获得新的主体性自觉,从而重新建构起自我的认同。新部落为个体尽情展示自我、结交新朋友提供了自由空间,从而使他们摆脱现实中的身份、地位、性别,甚至外貌、性格等方面的束缚。所有这些线上生活方式与生命体验以及在此过程确立的自我价值、获得的他人认可,都构成了这些亚文化群体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和资源。“日翻圈”为青年人“重塑自我”提供了无限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人表现出的惊人的自学能力和创造力,不仅对自我主体性的建构、对青年亚文化的实践,乃至对社会主流文化都具有积极意义。丰富的青年亚文化可以成为主流文化的创意之源。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互联网+”和“创客”概念已然在全社会引领一股“创业”潮,但如果失去了“创新”和“创造”,创业将成为无源之水。而经历青年亚文化洗礼并获得了丰富生命体验的年轻人恰可为社会提供创造动力。

抵抗仍是青年自我认同建构的主要方式,但区隔与娱乐成为抵抗在数字空间新的表现形式。西方后亚文化研究提出的“抵抗似乎已死”的问题,从数字空间的表现来看,下此结论为时尚早。“日翻圈”新的音乐生产方式,以及个体对主体自觉性的清醒认知,使得抵抗仍在,只是抵抗的对象、形式、范围甚至结果都发生了变化。抵抗更加“遍在化”。然而,阿尔伯特·科恩式的消极抵抗正在转为“虚化”的积极抵抗。人们在圈子中更多的目的是表达自我。青年借由主动表达自己的喜欢而实现对“不喜欢对象”的区隔,同时以娱乐的方式消解主流文化对青年文化的影响,从而以这样一种“虚化”的方式实现对主流文化的反叛与逃离。

最终,通过重新发现自我,并有效抗拒“他者”,青年在“日翻圈”建构起文化共同体,进而建构了自我。“日翻圈”成为青年亚文化的重要生产场域。但是,这种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割裂能否弥合,双方能否实现和解,研究获得的最大启示就是:在看待两者的关系时,我们需要摒弃二元对立的观念,杜绝“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思路。这个时代已然被多元文化所替代。我们应该消融对立,以“与我无二”的心态及观念去面对青年亚文化。因此“和解”的目标不是实现双方的融合,而应该是彼此接纳。亚文化的魅力恰在于它是“亚”的,如果它与主流文化实现融合,就不再是“亚”的了。等到喜欢“日翻”的人成长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比他们更年轻的生命又会创造出新的完全不同的文化。每个生命都有感受和经历新鲜文化的机会,这正是生命的馈赠。

## [ 参 考 文 献 ]

- [1][8] 马中红 陈霖:《无法忽视的另一种力量》,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2页。
- [2][5][6]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0、8、6页。
- [3] 克莱·舍基:《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胡泳 沈满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 [4] 任翔:《青年亚文化与价值冲突》,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 [7] 高宣扬:《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责任编辑:任天成)